

刘宜庆 著

紅塵往事

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



東方出版中心

紅塵往事

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

刘宜庆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刘宜庆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9.4

ISBN 978-7-80186-983-8

I. 红… II. 刘… III. 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7496 号

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285 千

印 张:12.25

插 页:2

印 数:0,001—5,100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983-8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言

我用两个晚上的时间，看了宜庆这本书。我要说这是一本负责的书，也是一本忠厚的书。这好像不是评价学术著作的语言，但我要这样来评价宜庆的书。

钱穆讲过，一个本国的公民当对自己国家以往的历史具温情和敬意。陈寅恪讲过，对历史当具了解之同情。宜庆这本书，大体合这个标准。我说负责任，是指他对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有了解之同情；说他忠厚，是指他对历史处境中人物的选择保持了温情和敬意。

选择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婚姻来研究，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宜庆的这种学术趣味就能看出他学术研究的思路，有趣味的学术最见一个人的才情，因为凡追求趣味的学术研究，多数没有功利目的，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宜庆没有用严格的学术规范来限制自己的才情，却保持着自己的学术追求。这本书事实均有所据，判断合乎逻辑，分析自成一格。

我过去也关注过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婚姻，我的感觉是婚姻关系中，通常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特别是在中国由传统婚姻向现代婚姻的过渡期间，婚姻关系最体现作家和学者的人格与学养。婚姻虽属个人私情，外人不好完全以此衡人论事，但以婚姻观察历史人物的思想品格，无疑是一个重要尺度。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明显的事实是左翼作家的婚姻好的不多，而自由主义作家的婚姻相对好一些。因左翼

以反抗现成社会秩序为基本特征，婚姻秩序自然也在其中。中国左翼作家的代表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周扬、丁玲等人，在婚姻关系中，多有受后人指责之处。左翼作家的婚姻不好，看似个人原因，与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家最后选择的人生道路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不好妄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了解作家对婚姻的态度和他们的婚姻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作家和学者的人生选择。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评价个人婚姻的成败，主要强调个人的责任，特别是婚姻角色中男性的责任感。熟悉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人，可以把左翼作家的婚姻作一个统计，然后再来判断他们的政治选择，从中或许可以找出一点因果关系。大体可以说，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责任上，一般来说是比较不负责的。婚姻上不负责任，很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随机应变。左翼思潮的主体是青年，特别是流浪青年。流浪可以说是左翼的必备因素，漂泊生涯中浪漫是其主要的生活特征。青春、激情和理想，再加上流浪和窘困，最后都要通过释放“力比多”来达到平衡。单就人生的丰富而言，左翼作家和学者的人生多有传奇色彩。中国传统的婚姻以保守为主要特点，但在左翼作家和学者，或者扩大一点来说，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婚姻对象常常在同伴中转移，而同伴之间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间婚姻对象的变换，常常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他们很快能把失败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热情抚平，虽然彼此的婚姻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间产生情敌的现象一般来说并不严重。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左翼作家、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婚姻谱系。

自由主义作家和学者在婚姻上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但总体观察相对要好。因为自由主义对既存的社会秩序，有较为深刻的判断

和分析，不简单盲目认同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加之生活相对安稳，婚姻多是在平静生活中的正常选择。婚姻的稳定性和幸福感，外人难以评说，但稳定是评价婚姻的重要因素。

宜庆本书回避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为人熟悉的婚姻关系，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而另外寻找相对陌生的婚姻关系来叙述，这使他的书有很强的新鲜感。当今重趣味的学术研究极少，宜庆这本书很难得。

谢 泳

民国学者的婚恋方式(代自序)

清末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文明以船坚炮利的方式进入封闭的中国。西风浩荡，礼乐崩溃，清末出生的那一代人注定生活在西学和中学的激荡之中，大到国家的意识形态、物质文明，小到生活方式、婚恋观念，都在变革之中。诚如陈映真评价冯友兰：“不满足于学殖万卷的经师，还要去寻找立命安心的‘人师’，为轻舟激水的人生找一注脚，为西风落叶的时代找一归宿。”经过百年沧桑之后，我们回望那一代学人的情感故事，可以看到他们在西风落叶时代的人生剪影，以及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

为什么从恋爱、婚姻和家庭的视角来考察那一代学人的人生遭际和历史命运？是受清代学者戴震（字东原）一句话的启发，戴东原在《孟子字义疏证·二十一》中说：“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这是胡适服膺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仁义礼智”要在“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中求，这是对人性与道德的合情合理的阐释。事实上，将那一代学人的婚恋和家庭生活细节放在20世纪历史风云中考察，情感的宿命，人生的无常，生活的漂泊，精神的求索，乃至民族的大义、历史的荒谬、时代的诡异，都会一一呈现。只有把时代的一切落实到一个个鲜活而具有个性的学者身上，看他们的生活和经验、情感和心灵，才会看清楚历史的影像，以及时代的变迁。当私人情感进入到公共的历史领域，就避免了学人形象的符号化。

唐德刚在探讨胡适的婚姻的文章——《较好的一半》——中提出：胡先生那一辈的知识分子，是我国三千年婚姻史上，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婚姻制度和三种不同的婚后生活方式的唯一的一辈！这三种制度便是：一、纯粹农业社会所特有的“旧式婚姻”；二、工业文明社会里的合伙制的西式婚姻；三、“转移时代”（transitional period）里，半中不西的所谓“新式婚姻”。

笔者从那一代学者的婚恋方式入手，将他们的婚恋分为三种：一、旧式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人在婚恋中被人支配，处于被动的地位，个人的意志似乎完全被忽略不计；二、半中半西，亲友了解双方的情况，为之牵线搭桥，双方有一定的自由，能否走到一起，要看缘分了；三、自由恋爱，自己的婚姻自己作主，看好另一半，主动追求，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除此之外，民国的学者还有不少人娶了外国太太，自由恋爱到了海外，发展成为跨国婚姻；还有少数另类的婚姻，为时人侧目。这两类婚姻型态也列举在此文中。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那个时代的婚姻，不只是单纯的择偶问题，那也是个婚姻“制度”和婚后“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虽然婚恋恋爱是私人的事情，但婚恋从细微处折射出社会影像和时代思潮。

一、旧式婚姻

胡适那一代学人，很少能有逃脱时代强加给他们的旧式婚姻者。旧式婚姻也有很多类型，有亲上加亲，比如俞平伯和许宝驯结为夫妇，俞平伯娶的是舅舅家的表姐；有指腹为婚，比如诗人汪静之还没有出生，已经被指定了婚姻。旧式婚姻基本上是门当户对，书香世家的才子娶小家碧玉或者大家闺秀，商人士绅的子女之间互相通婚，官员的子女之间互相通婚。

对待旧式婚姻的态度，也不一样。胡适孝顺，不愿让母亲痛苦，接受了江冬秀，“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对江冬秀“从一而终”。于是，“胡适大名垂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成为民国一大奇观。

说实在话，青年的胡适虽然颇受异性的爱慕，也有好多次机会另娶，但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招蜂惹蝶之人；不像他的好友徐志摩，所到之处便蜂蝶乱飞！

胡适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个什么“大胆作风”。加以他对他的婚姻也颇能想出一套深足自慰的哲学；婚后蔗境弥甘。所以他也就与冬秀夫人和和平平四十年，始终不离不弃；他们白首相依，度过人生风雨。

鲁迅倔强，只给原配夫人朱安一个名分。这桩包办的姻缘，让两个人都痛苦，鲁迅与朱安没有夫妻之实，说到底，这个错误的姻缘，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朱安——尽管在名分上是周家的大夫人。后来，鲁迅在许广平的主动追求下，经过两地鸿雁传书，恋爱结婚，成了民国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是师生恋。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可谓美满、幸福，只可惜鲁迅去世太早。“民国版的孔夫子和贾宝玉”吴宓，很羡慕鲁迅与许广平的“老夫少妻”，曾酸溜溜地说：“鲁迅夫人许广平（景宋），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既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吴宓心中一直有一个师生恋情结，毫不过分地说，这个情结误了他一生。

那一代到欧美、日本留学的人，多是家有原配夫人的，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之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往往与原配夫人离婚，另娶志趣相投的女性知识分子。

不妨以物理学家吴有训为个案，看看旧的姻缘新的婚姻怎样在那一代人身上交织。

1919年春节刚过，吴有训的母亲不幸病逝，他不忍违背母亲的遗愿，只好与表姐邓味英结为秦晋之好。表姐邓味英，是吴有训母亲的胞弟邓帮杰的女儿，尽管见过几面，但是并不了解，更无感情可言。邓味英生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戌时），长吴有训一岁。那是吴有训的母亲生前请算命先生排八字时定下的。

1921年阴历九月十四日，邓味英生下了长子吴成冠。随后，吴有训到美国留学，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吴有训学成回国后，被聘为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兼任物理系主任。

在此期间，吴有训对自己的婚姻多次严肃思考。他深深感到自己与邓氏并无感情基础，决心与邓味英离婚。于是，他向校方请假回家乡，与邓味英反复讲明利害关系，并将家庭作了妥善安排，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吴有训在上海逗留了一些日子，在朋友杨杏佛的介绍下，结识了王立芬女士。王立芬在南翔嘉定县立高小任教，出身于名门望族，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又爱好音乐和文艺。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以后，他俩互通书信，关系日益密切。吴有训越来越觉得王立芬心地善良、贤淑，很关心自己的事业，是自己的意中人。1929年7月他们俩于上海完婚，主婚人自然是杨杏佛。从此，吴有训与王立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吴有训的婚姻经历，是那一代学者在婚姻、恋爱方面的缩影：与老家的原配夫人离婚后，经亲友介绍，与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结合组成家庭。只不过，有的是在与原配夫人离婚之前就有了意中人。

那一代学者几乎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有的为了从旧式婚姻

中解脱出来，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和原配夫人离婚，甚至闹出悲剧。那些学者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恋爱，多以原配夫人的心碎和泪水为代价，默默无闻的原配夫人离异后，难以再婚再嫁。有孩子的还可以像《红楼梦》中的李纨，期待母以子贵；没有孩子的，就像朱安一样，守一辈子活寡。

二、半中半西

那一代学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当时都是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尤其是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海外留学归来者，有教育、科技救国的理想和抱负，以其所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他们之间，或有乡亲之谊，或有师生之谊，或惺惺相惜。在婚姻方面，他们寻找另一半的方式，采取的多是中国传统的月老牵线结缘。不过和旧式的包办婚姻相比，介绍给这些学者的女性，多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少数女性也走出了国门留学海外，学识、眼界和旧女性有云壤之别。她们有和学者对话、沟通的精神基础，所以这种介绍对象的成功率颇高。

最典型的是竺可桢的两次婚姻，都是由亲友或同事介绍玉成。竺可桢在美国留学期间，张默君（也在美国留学）为妹张侠魂择婿，因竺可桢“年少美才”，替妹妹看好了他。1920年，竺可桢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侠魂结婚。1938年，浙江大学西迁，校长竺可桢忙于学校搬迁，无暇照顾得了疟疾的张侠魂，结果她不治而亡。后来，竺可桢经同事的太太介绍认识陈源的胞妹陈汲，两人相识相恋，结为夫妇。

也有介绍不成功的例子。

陈寅恪刚到清华大学任教时，仍是单身，三十七八岁了，自己不着急，朋友吴宓热心地为他介绍对象。据吴宓1927年10月的日

记，吴宓为陈寅恪介绍的这位女士叫钟佩怀，广东蕉岭人，是美术学校国画专业的学生。吴宓认为钟佩怀外貌甚美，“豪爽而能事，通达世情而识解甚高，洵可取也”。吴宓动员陈寅恪和钟佩怀见面，可能是不忍拂友好意，陈寅恪决定和其见面。11月5日，钟佩怀和陈寅恪在吴宓家中见面。一向诚恳的吴宓这次用了一个小花招，他没有把相亲的这层意思告诉给钟佩怀，大概是想先试探陈寅恪的态度如何。吴宓本以为，陈寅恪能看好钟佩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陈寅恪委婉地告诉他，自己喜欢的女性是“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知识分子类型)”，认为钟女士只能算是中等，“再见亦可，不必求觐”。热心的吴宓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陈寅恪此时正在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唐筼处对象，是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介绍的。陈寅恪所说的理想中的伴侣——“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知识分子类型)”——正是唐筼的形象。

吴宓热心，大有为钟女士负责的意思，像师长一样，又将她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黄华，广东人，吴宓当年留学美国的同学，此时在上海做律师。这次介绍，也没有成功。原来，钟女士对吴宓的好友、已有家室的姜忠奎有好感（暗恋？），吴宓如此热心地为钟女士介绍对象，虽是好意，但没有顾及钟女士的心理感受，使她感到尴尬。后来，钟女士郑重地向吴宓表示，自己不考虑婚姻，坚持独身主义。

吴宓热心做冰人，他与妻子陈心一离异后，自然不乏有为他介绍对象者。据1937年10月22日的日记记载，吴宓与贺麟赴毛子水宅茶会。此时，吴宓即将南渡，毛子水居住处园屋雅洁，花木绚美，这更让他留恋故都。茶会客有徐芳女士、方女士。吴宓写到徐芳的衣着，“黑衣，蓝花边，实甚温美”，毛子水有意为吴宓介绍徐芳，吴宓在日记中以小字注释说明。当然，毛子水的介绍也没有成功。

三、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的前提是以妇女解放、女性接受教育、在社会上有工作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为条件的。这是工业革命后才出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女性没有独立的能力和条件，自己的生活依附于男性和家庭。在封建制的男权社会，不可能有自由恋爱。清末民初，几千年的冻土开始融化，随着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天地当中有我”，中国女性独立意识觉醒。佛家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慧能灭万年愚。”中国女性冲出闺阁，冲破封建桎梏，如天风地火般呼吁自身的权利，追求自由、平等，以及各项天赋人权。中国迎来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女性。涌现出的女性中不仅有秋瑾、张默君这样的女英雄，也有像陈衡哲、杨步伟这样走出国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知识女性。

民国时期，那些留洋归来的学者不仅是思想的先知先觉者，也是新的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西方盛行的男女自由恋爱，他们耳濡目染，成为自由恋爱、文明婚礼的先行者。

当年赵元任、杨步伟新人物新式婚礼具有很大的感召力，经报纸报道后，为年轻人模仿的典范。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周培源、王蒂澂夫妇都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典范人物。他们一方面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大学教授、文化名流，为年轻学子羡慕和追随，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同样是自由恋爱，自由倒是自由了，但引来满城风雨。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竟与自己女儿的同学发生恋情，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有美女一人，怡然自乐。并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

这里讲一讲两位体育系教授的自由恋爱的故事。

1932年，中国首次派遣运动员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东北大学体育科（后改系）主任郝更生促成张学良少帅资助中国代表团成行。说是代表团，其实一行只有三人：领队沈嗣良、教练宋君复和队员刘长春。郝更生、宋君复此时在东北大学体育系任教。我们来关注一下郝更生的爱情与婚姻。

郝更生（1899~1976），中国体育活动家。江苏淮安人。1925年毕业于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旧译春田大学）。回国后任东吴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29年至1932年代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主任，后任教山东大学（校址在青岛）。

郝更生的夫人姓高名梓，曾在美留学，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回国后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与高梓在美留学期间互相倾慕，但未谋面。郝更生是中国留美学生中专攻体育最早的一个，高梓则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中锋，是该队唯一的一位中国人。两人在留学生中均小有名气。1924年，第三届全国运动大会在武汉举行。郝更生主持筹备，高梓作为华东女子手球队领队，率队赴武汉，两人第一次见了面。因两人酷爱体育，趣味相投，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自此，两颗心便紧紧连在一起。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郝更生经常乘车进城，掏大洋付车费毫不吝惜。那时，清华园距北京城十多里，进城要坐出租车。郝更生进城工作、约会合二为一，他兼任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体育联合会会长，而高梓是副会长。

两位体育教授、又是会长与副会长的频频约会，在学校和体育联合会引起种种议论。议论最多的是高梓所在的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高梓生性活泼，为人直爽，且学有专长，早成为大家瞩目

的风流人物。追求者甚众，其中有大学校长、教授，甚至有年龄稍大一点的学生。有位教师献殷勤地形容说：“高教授在运动场上，就像蝴蝶在花丛中飞翔。”这只“蝴蝶”翩翩起舞，却飞到郝更生身旁，令众多“捕蝶者”扑了个空。朋友向郝更生打趣说：“你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郝更生听了很是得意。

1929年2月6日，郝更生和高梓在北京举行婚礼。他们的好友徐志摩特地用三张宣纸，写了一幅长篇累牍的结婚贺词。徐志摩与新婚夫妇彼此十分熟悉，开惯了玩笑，因此贺词写得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徐志摩的《爱眉小札》中提到郝更生、高梓夫妇，可能因为郝更生和梁思成、林徽因同在东北大学任教的缘故。

在郝更生和高梓的婚礼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天津的音乐家杜庭修，专程从天津赶到北京参加好友婚礼，他送了一副自撰自写的贺联，令人捧腹大笑：

两位体育名家，两体合为一体；

一件结婚大事，结婚不许离婚。

上下联对仗还算工整，全是大实话，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有失雅驯，有恶作剧的味道。贺联高高挂起，众人拍案叫绝！郝更生感觉难堪，急忙叫人把贺联撤下。音乐家坚决阻止，郝更生竟然在大喜之日，当着众人面与这位结识多年的音乐家朋友翻了脸。后来人们才知道，郝更生是怕新娘子不悦才大发脾气的。婚后，郝更生果然以怕老婆闻名。

1932年，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受到日寇、“伪满洲国”的种种阻挠，东北大学决定马上让刘长春离开北平，以免夜长梦多。为了确保刘长春顺利出行，郝更生主动请缨，愿偕同夫人高梓陪送。郝更生夫妇明明知道此行有危险，但还是义无反顾

地陪同刘长春、宋君复悄悄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7月3日他们安全抵达上海,很快,《大公报》和《申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刊登郝更生的文章,标题赫然醒目:《郝更生谈刘长春代表赴美使命》,为中国体育史创造新纪元,打破日人之伪国无稽宣传》。随后,郝更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首次派代表参加奥运会的经过。刘长春代表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其顺利出行,郝更生高梓夫妇功不可没。

四、学者的跨国婚姻

晚清民初,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出洋留学,除了欧美,最多的就是日本。不少留学生娶了外国女人做太太。比如,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是日本人,何思源娶了法国女人宜文妮·詹姆斯(中文名字何宜文)做太太,张道藩娶了法国女人素珊做太太,杨宪益的太太戴乃迭是英国人。民国时期的跨国婚姻,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的。

娶外国女人做太太,有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外国太太对学者的生活方式、精神趣味带来影响,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人生道路,我们不妨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何思源和何宜文这两对夫妇做个简单的对比。

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两件大事,羽太信子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与鲁迅在八道湾的决裂,二是周作人“七七事变”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后落水出任伪职。

1908年4月8日,周作人与鲁迅、许寿裳等五人迁居到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一处房子。这一天,周作人遇到了羽太信子。即使是到了晚年,周作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与羽太信子相遇的日子。只能是上帝的安排,在两人相遇54周年的1962年4月8日,羽太信子在

北京离开人世。周作人跟羽太信子于1909年3月18日登记结婚。从认识到结婚,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周作人由于娶日本女性为妻,身边交往的也多是日本人,加上他浓厚的文人气质,成了一位深爱日本文化的人。

周作人与鲁迅失和,和羽太信子有直接关系。在周建人看来,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喜欢享受,惯于挥霍,说她“挥金如土”也不过分。“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当泼悍,而周作人耳根子软,只要能安静地读书,对羽太信子的要求无所不应,结果是枕边风压倒了手足情。因家庭经济问题,在羽太信子的挑拨下,致使兄弟反目成仇。

1937年末,周作人没有随北京大学迁往大西南,而是留在了日军占领下的北京。滞留北京的原因有若干,原因之一显然在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在同年9月26日写给友人陶亢德的信中,周作人说自己“系累甚重”,“系累”何来?是日本妻子吧。也有文章说,羽太信子曾劝周作人南下,别失“民族气节”。关于周作人何以当“汉奸”,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不失公允、中肯。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影响,只是影响,不是关键因素,不能把其附逆下水说成是羽太信子造成的。如果周作人铁定南下,还是有机会的,刘文典历尽周折到昆明就是很好的参照;即使有家累留在北京,俞平伯的洁身自好也是很好的参照。

假如妻子不是日本人,周作人的人生道路可能是另外一条,其命运显然是另一种情形。可是,历史不容假设。周作人对其一失足成千古恨,是不是内心深处有反省和悔恨?1960年7月31日,在和羽太信子闹矛盾之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宿业殆无已时。”